



海国图志丛书

西南大学海国图志书院 主办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 协办

德意志问题

〔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著 林国荣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德意志问题

〔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著 林国荣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810.1
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著;林国荣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301-24179-0

I. ①德… II. ①英… ②林… III. ①德意志帝国—历史—研究
IV. ①K51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1347号

The Problem of Germany: An Interim Report By A Chatham House Study Group (New York
Toronto Bombay Melbourne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June 1943

Reprinted, with certain revision, October 1943

Reprinted, April 1944

Reprinted, June 1945

书 名 德意志问题

DEYIZHI WENTI

著作责任者 (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著 林国荣 译

责任编辑 倪宇洁 毛晓秋(特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79-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1.75印张 151千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译者导言

本书源自世界著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组织人手完成的一份报告。报告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单一的,那就是“大不列颠的安全”,这一点很明确。报告完成于1942年,希特勒在此前一年发动的“巴巴罗萨计划”正是在这段时间遭遇了决定性的“莫斯科之冬”,北非战事也在这段时间陷入停滞局面,纳粹的命运可以说在这一刻已经注定了。因此,这份报告尽管在成稿的标题中自称“中期报告”,但这并非意味着报告本身的应时性质或者过渡性质,相反,报告本身分别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连续重印,这充分说明了这份报告的分量并不会因为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折损或者消逝。正如前言和概要中指出的:“我们将选择那些最不可能因为时间流逝而失效的问题,而非那些主要属于清算程序的问题(诸如惩治战犯、修复战争破坏或者秩序和重建等即时问题)。清算程序所采取的步骤以及态度,确实会对后续事

件产生不可谓不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应当在长远观点中获得导向。”这份报告的意图并非就这些重大问题给出最终之言,事实上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终极之言,“即便胜利的预示在今天已经比当初清晰得多了”。

报告所谓的“长远观点”实际上是回溯性质的,而非前瞻性性质的,确切地说,这份报告无意像国际战略领域的研究报告通常会做的那样,以自我强迫的形式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相反,这份报告满足于在对一个时代的境遇进行完整剖析的前提下,提请人们对过去和当前的人类处境保持理智和清醒。毫无疑问,这份报告忠实且充分地履行了埃庇米修斯的义务。报告的字里行间都要求人们不要忘记《凡尔赛条约》所造成的悲剧,不要汲汲于建立复仇式的清算机制,却忘记了彼此间即便作为往日的仇敌也不可能剪断的关联和倚靠;让仇恨取代记忆往往是开启通往另一场灾难之门的钥匙,也许历史很难重演,但历史中蕴涵的很多问题则是不会失效的,人们应当依照这些问题建立起“长远观点”。这些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已经揭示出来,但在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些问题最终无法沉淀为“历史教训”并为人们所汲取。沃尔姆赛德勒少校在1941年5月26日的《德意志信使》的访谈中谈道:“《凡尔赛条约》规定要将上次战争中的德意志武装全部剪除,并差不多完全摧毁德意志的军事工业。但是敌人忘记了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向德意志发布禁令,那就是重整军备问题上的精神主张以及精神准备。德意

志的防卫意志是他们无法加以奴役的,因此,在战败的早期阶段,重整军备的基础工作就已经奠定了,尽管有各种控制委员会和监督举措。他国的军事发展都在德意志得到了仔细研究,训练出一批军官,遵循上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开启了新的军事研究、建设和测试活动。德意志国家自身能够提供的帮助极少,陆军军械部不得不靠自身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来执行大多数的举措。因此,1933年元首上台之时,就发现进一步扩张军力的基础已经奠定了。”确实,有复仇之心却无复仇之志,有复仇之政策,但完全缺乏将政策贯彻到底的资源 and 能力,此种局面只能刺激更大的仇恨和敌意,不会带来任何建设性结果。依托任何联盟或者联邦体系获得的国际保证,若缺乏这样的意志和执行力作为后盾,都将无果而终,宗教战争时期的新旧教联盟以及美国内战前夜的《邦联条例》实质上都并非和平的保证,而是战争的干柴堆,究其因由,也正在于此。这也正是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一度着力施加反讽的一点。

1942年战争正酣之际,各国的牺牲也在急速扩张。仇恨再次难以遏制地在人们的胸膛里燃烧。越来越多的人将当前的纳粹体制同俾斯麦时代乃至前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体制勾连起来,力图将时代的仇恨深深扎根在世系当中,以便为战后清算作出心理铺垫,像摩根索设想的那样,从根本上将普鲁士从德意志肌体中切掉,使之变成“像母牛一般温顺”的国家。弗兰茨·博克瑙在这一年4—6月的《政治学季刊》上发

表的“普鲁士神话”一文就曾谈到：“从其伟大起源开始，普鲁士就已经深染一种信念，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努力和压力，足够的‘普鲁士效能’，就能做出任何事情，即便人的材料也能制造并随意改造。对于一种全然建基于强力之上的权能来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观点，这样的权能势必要蔑视传统，并尊奉效能为上帝。纳粹创造一个全新人种的观念，借助于恐怖、宣传、移民并剪除不驯服者的手段来达成，这一纳粹观念实际上同上述普鲁士传统乃是一脉相承的，纳粹观念的其他方面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反普鲁士特征，而上述一点则是最具有普鲁士特征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历史研究中最为忌讳的“单一线索”方法，这种方法更多地是依靠在事实和因果分析中强制性塞入的“类比”和“想象”而运行。这种方法是无法诉求历史智识原则的，也是无从站得住脚的。然而，鉴于民族仇恨以及根源于“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民族原则所激发起来的人类情感潮流如此强大并主宰时代，有关战争起因的控辩性质的假设之词也便只能围绕民族情绪和仇恨原则展开，这份报告在附录中可以说是开具了一份完整的有关战争起因的“情绪清单”：

1. 德意志是个天生赋有侵略性的民族；正是出于这种天生的侵略性，德意志人较之其他欧洲民族仍显得不那么开化（许多人正是这么看的），基督教也是因此扎根不那么深。在我们这个时代，此种事态是无法大幅度改变的。德意志只屈从那种更卓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

能够得到确认。

2. 德意志人首先也是人,应当以人的方式加以理解,将无可变更的特性归之于整个民族,此种泛泛之举是误导性的。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德意志毫无疑问地展示出侵略性,但是,即便可以将这种侵略性部分地归因于种族,同样也应当在环境、尤其是教育当中寻找起因。一直以来,德意志人乐于倾听的教师都是这样一些集团(普鲁士军国主义集团、纳粹集团等)或者个人,他们的世界观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种观念则是共同的:若时机成熟,就可以对他人的权利予以暴力性地践踏;不过,很多德意志人相比已经拒斥了此种观念,而且,作为整体的一个民族(除了一些数量有限的范畴,这些范畴是无法治疗的)也是有可能接受教育并拒斥此种观念的。

3. 德意志最近表现出侵略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意志自1918年以来所经历的困难。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困难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凡尔赛条约》的过分严厉,假如条约不那么严厉,那么德意志的政策势必会具有更高的合作成分。另一种替代性的观点认为,条约的条款并非德意志人遭受困苦的原因,这些困苦并非不值得怀疑,相反,是德意志方面的宣传使得德意志人认为自己在受苦,此类宣传得到了其他国家在总体上的容忍甚至怂恿。此类说服行动,加之,条约似乎冒犯了德意志的“威望”以及其他心理上的应激要素,这一切就成为了德意志侵

略性的首因。

4. 尽管一项不那么严厉的和平条约以及随后的处理办法,不一定能阻止德意志的侵略政策,但是若能认识到如下情况,则还是可以阻止德意志的侵略政策的:德意志是一个“有所欲求”的大国,若能够在不失限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给予让步,说不定可以将德意志转化成一个“自我满足”的大国。

5. 德意志近来的侵略精神乃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1918年之后,德意志得到了过于温和的待遇,不存在有着决胜之心的打击,没有断然的军备控制等等。假如当初的措施得力,那么是可以遏止德意志的。

6. 德意志近来的侵略精神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德意志领袖人物所倾心的目标只能通过战争来达成,或者最起码来说,德意志领袖人物所使用的方法,比如在经济政策领域,将使得战争成为很自然的结果。人民,或者说,人民当中有着足够分量的那些部分,他们之所以追随这些领袖人物,是因为:

(a) 他们都有着战斗欲望,或者最起码也期望从战争中获益;或者

(b) 他们认为战争乃第三帝国的“使命”,因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或者

(c) 尽管他们厌恶战争,但他们在政治上并不成熟,这使得他们未能认识到危险所在,或者说,即便他们认识

到危险，政治上的不成熟也使得他们未能推翻其领导人；或者

(d) 他们乐于不计任何代价地支持任何人，只要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大规模失业的泥沼。

7. 像德意志在 1939 年所诉求的那种侵略行为，乃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特定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结果，由此，这些侵略行为都是可以获得充分解释的。

8. 德意志的侵略精神可以理解为一种尝试，试图有意识地通过强力来纠正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加之于德意志的不公。在俄国、法国、英格兰和美国致力于建造并巩固各自的帝国之时，德意志还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此前的德意志一直都未能创造出为帝国扩张所必须的民族身份、统一性及其都城。等到德意志完成这些创建之时，扩张机会已经非常有限了。和其他民族相比，德意志民族及其人民无法为其企业的工业、科技乃至生物学潜能提供出口（在德意志看来，其他民族在这些方面的能力要逊于自己）。

9. 侵略性并非德意志政策独有的特性。所有国家都会竭尽所能借助最趁手的办法来自我伸张，无论是军事手段、经济手段还是道德手段。德意志只不过是碰巧成为欧洲侵略冲动最强有力的担纲者，如同往日的西班牙以及随后的法国那样。此种冲动将会遭遇失败，原因是外部所无法控制的。

10. 德意志不曾有过什么侵略性。他不过是在自我防卫,对抗外来威胁,比如四邻环伺的地理处境、斯拉夫威胁等。

11. “侵略”一词含有道德上的谴责之意,这个词并不合适。德意志人只不过是在针对此等对手而确认自身作为一个优越民族的权利。尽管对此一权利的判断除了德意志人自身的标准之外,别无其他标准,欧洲的第一波反应之孱弱实际上等于是承认了德意志人的判断。

12. 德意志之所以诉求战争,乃是为了将欧洲从犹太和布尔什维克影响力中拯救出来,也从世俗的不列颠分化政策中拯救出来;最终由此来完成创建欧洲之统一性的大业,这一点正是当前的历史时刻所给出的命令。

很显然,依据这份假设性的“情感清单”,控辩双方在战争起因问题上存在难以兼容的冲突。报告并未选择一个立场并介入这场控辩,而是秉持“长远观点”,对历史教训进行了剖析,这场教训的塑造者显然并非德意志一家,换言之,在这场灾难中包含了复杂的线索可供追寻,历史所展示的乃是多重线索交叉并进的图景:“本报告从上次战争之后的裁军史中得出的主要教训就在于,阻止德意志重新武装的技术困难并非不可克服;真正的危险环节在于阻止德意志重新武装的盟国意志会削弱下去。研究小组对此进行了仔细考虑,认为阻止德意志重新武装是不列颠应予以无条件坚持的唯一威慑之策。但是,会遭遇到观念上的挑战,如同武器方面的挑战

一样。除非在德意志个人身上,以及德意志国家身上能够培育起真正的、而非表面上的合作精神,否则便无法达成最终安全。”

不过,这份报告并未就仇恨情感对于国际正义原则可能造成的遮蔽和损害投入笔墨,严格的分析立场使得报告对情感因素视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历史力量,并对之进行了客观的呈现,这种力量就是不列颠自布尔战争以来便日益凸显其主流地位的民族主义情感,报告转引了两份代表性话语作为这种力量的体现:“……自 1879 年自由贸易体系破碎之时起……德意志心灵就已经完全远离了所有英国人的同情心。”(“Anglo-German Rivalry”, *The Round Table*, 1910 年 11 月)、“……有一点确实很清楚,德意志如今已经成为如此令人生畏的仇敌,一个从根本上就要求予以击败的敌人,这倒并非出于以下的直接原因:一种德意志特有的虚假教义已然攫取了德意志心灵,德意志对此信念的持守也正如同盟国对自身信念的持守一样;而且更因为一种纯粹赚钱的精神以及没有止境的商业精神已经在德意志灵魂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这种灵魂则令人难以置信地毒辣、专注、系统且充满灵性,尽管牟利精神和商业精神也都主宰着我们所有人而且让我们都庸俗化。”(F. von. Huger, “The German Soul and the Great War”, *The Quest*, 1916 年 1 月)此类观念实际上培育出了两次大战期间盛行一时的远离国际正义原则的犬儒主义情绪,正如贝尔福勋爵在谈到大战时的有名的调侃式评论所揭示的那样:

不列颠无非是按照历史惯例消灭了又一个贸易对手而已。

遭到滥用的民族情感和犬儒主义的经济论析在此完成了大众和精英的汇流,这在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依据此种思路,在战争全然展示出胜利前景的情况下,一项纯粹强制性的战后对德政策就是题中之义了,报告并不探讨纯粹强制性政策本身的对与错,而只是尽可能以综合的方式就此种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其前提、过程、结果,进行剖析:

一项纯粹的强制政策,其涵义倒并不在于种种压迫性措施的集合,而在于那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和总体性的目标,此即让敌人屈服。假如这一点是目标本身所需要的,那么也同样有必要将强制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另一个领域,直到强制力控制一切。德意志针对波兰的政策就是这个问题上最好的现代模板。对德意志采取这样的政策,也将同样意味着差不多是完全否决德意志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以及德意志人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利。在避免采取大规模灭绝这一恐吓举措的同时,依据此种模式,强制政策的目标很可能就在于逐渐削弱并减少德意志人口。这也就意味着让所有争议领土脱离德意志,其他方面的利益则自动地获得针对德意志的优先权;意味着第三帝国的强制性解体;意味着完全摧毁德意志权能的工业和经济基础;通过强制性地放弃高等教育,尤其是放弃科学研究,摧毁德意志的智识基础;同时也将意味着人口迁移;维持一种顺服的劳动状态和社会状态;禁止德意志人移

民甚至旅行,以免德意志的军事、工业和科学专家获取国外影响力。如果要获得针对德意志入侵的安全屏障而先不考虑别的东西,那么上述举措以及其他许多举措都是必须采取的。

这项政策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些盟国将会同不列颠一起执行政策,不过可以肯定这其中包括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占领军的维持工作;也包括了对德贸易的折损,因为德意志按照预期将会落入贫困境地;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强制阻止其他大国同德意志的贸易往来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对德意志共同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持久监督;为达成压制德意志这一至高目的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国际利益;毫不妥协地持守已定目的,因为任何松懈都将是致命的。值得怀疑的是,若出于纯粹政治性的动机,这样的政策是否能够得到维系,最起码也应该考虑到,防御性的审慎并不是那么具有掌控力的动力机制;要在这样的政策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宣示出我们是主人民族而德意志人只是亚人种那样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必须纳粹化。执行这样一项政策,高度违背了我们的重大国家传统,也许只有16和17世纪我们处理爱尔兰问题的例子能在大致同等的规模上提供直接的经验和教训。

毫无疑问,报告几乎是完整地再现了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对《凡尔赛条约》的经济—政治逻辑及其可能的结果所作过的剖析,只是祛除了凯恩斯特有的那种反讽口吻而已。

同纯粹强制性政策处在逻辑对立端的则是纯粹合作性政策,报告同样对之进行了剖析,并不列颠和中欧的角度揭示了这一政策的可行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德意志人长期以来在操控巨大的企业联合体或者垄断体时就展示出相当水准的技术,同时,他们在欧洲规模上的战争组织以及规划方面的经验,也会让德意志处于一个很强大的位置上。那些将福利而非权力作为经济政策之目标,借此来阻止欧洲资源再次臣服于德意志政治目标的国家,因此也就必须具备坚定的决心和相当程度的能力。另一方面,朝向欧洲以及世界经济的更为理性化的组织形态的运动,以及朝向国家经济需求的合作性调整的运动,若这两项运动都遭遇失败,那么不歧视原则也就会丧失其涵义,而仅仅是意味着承认各个经济单位都有权充分利用其在一个相互倾轧的世界中的地位。德意志是欧洲最为强大的经济单位,而且已经发展出高度的技巧,得以将他国的经济屈从于自身的经济,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重新整合进德意志体系的事情就并非不可预期,除非不列颠、美国和俄国采取措施,将弱国从德意志依附者的地位上解脱出来,因为德意志一直就是这些弱国产品的“唯一消费者”。就不列颠来说,这很可能要求其在帝国导向的政策上做出重大变化;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削减保护性关税;就俄国而言,这意味着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对外贸易。因此,从各个观点来看,问题本身与其说是同德意志进行合作,倒不如说是同欧

洲的那些经济弱国进行合作,以及做出持续的努力来改善这些国家的地位。唯有如此,才能找到恰当的手段开发欧洲经济资源,而这样的手段将会允许充分利用德意志的工业技术,也会让作为个体的德意志人分享后续的繁荣,同时亦会让欧洲避免再次沦入遭受德意志经济奴役的境地。除非我们在应对德意志的经济霸权意志之时,能给出属性截然不同的目标体系,但却同样富有活力,否则所谓“合作”就有可能沦为对德意志霸权事实的默认;若真如此,那么接下来就是逐渐让我们自身的资源臣服于德意志的政治—经济目标。

作为合作性政策的这一推定结果,实际上也正是 1930 年代德国依托周边国建立起物物交换的中欧经贸体系时所最终实施的;这一体系展示出极高的经济技术和技巧,成功摆脱了“黄金十字架”的国际制约,并成为纯粹掠夺性的、预演性的战时经济体系。实质上,面对此种“既成事实”,凡尔赛体系无话可说;凡尔赛的那场“精英的盛宴”充斥着 19 世纪的遗风,并未意识到安全保证和经济繁荣之间高度复杂且微妙的联系。最终,“安全保证”和“经济繁荣”在历时一代人的所谓和平考验中演化成两个极端且彼此对峙的抽象观念,战后政策的执行历程便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突进性质的跳跃和摇摆。局面便在一轮又一轮的跳跃和摇摆中走上一条恶性循环的不归路。

《大西洋宪章》依照罗斯福所提供的“四项自由”作为基础蓝图而设定,然而,德意志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正

是在四项自由的内部倾轧以及四项自由所造成的整体性社会—经济矛盾中,因不堪重负而最终触礁沉没的。对此,报告给出了中肯的分析和些许的展望:

德意志投身纳粹,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种逃避此类缺陷和矛盾的尝试。随着战争的失败以及纳粹的崩溃,德意志人也用不着外人来告诉他们这是一次虚假的尝试。但是,经济、心理以及社会方面的失序,纳粹一度为这一切提供了虚假的疗法,如今将会继续对那些尝试在德意志塑造新的社会环境的人提出挑战。此外,尽管一定不能将一个新欧洲的议程留待德意志人的需要和经验去确定,但是德意志人的经验实际上也表征着在现代社会中广为散布的紧张因素。自由能够为将来提供基础性的统一性观念,在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之时,一项重大因素就在于:在一个倾向于逃避上述四种缺陷和危险的社会中,能否实现或者保存自由。

实质上,社会民主党自 1905 年开辟了 20 世纪德意志激进政治的全部概念之后,便实施了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阉割术,一战之后,激进派寻找到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并寻求超议会的解决办法,改良派则认定群众没有能力追求自身的利益,于是转而持守 18 世纪的那种进步主义的乐观主义,这在大战后的政治经验世界中,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纯真的信仰,认为统治阶级最终能够看到社会秩序中理性和正义统治之所需。同时,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老社会民主党时代有着为期十多年的痛苦经验,他们从这种经验中承袭的德意志式